

清明时节雨纷纷。这句诗一被写出,它里面的雨就一直下到现在,还将在中国人的心里继续下下去,因为它其实不是雨,有雨无雨,清明都还是那个清明。

清明,这个生者看望死者的日子被安排在暮春,是出于偶然吗?——怒放的油菜花、桃花,到了清明已经开始谢了,麦苗也已经不再是麦苗,而是青青的麦子,那种忧郁的乌云一样低垂的青,没有人能抬得起它们。

年年这天,我和我的家人几乎都是踏着泥泞,步行到一座山上去祭扫祖坟,而十二年前,母亲也安眠在那儿,再也没有回来。

通向祖坟的路穿过一个热闹的集镇,然后经过一个村庄,接下去就是在山冈上高高低低油菜地里穿行的路了——这好像是应该的。每年,我都看到小路两边星星点点开满了荠菜花,碎碎的白色,仿佛特意长在通向坟莹的路上。也有几棵桃树,但它们并不长在一起,而是离得很远,孤单地立在路边,枝上都只有些许衰败的桃花,而地上的落红往往也已被踩进泥里,几乎不能辨认。这样的日子,走在这样的路上,我们都很少说话。

祖母在我5岁时就去世了。那时

市民广场与文化广场静立于稼先路两侧,如一双惶怍的眼,一睁一闭,便是岁月流转。千禧桥似一段温婉的臂弯,轻轻搭在流淌的时光之上。自桥头缓步而上,便能望见一幢旧楼,墙上两行大字格外分明:“让世界了解怀宁,让怀宁走向世界”。

白日车流不绝,夜晚霓虹斑斓,那两行字仿佛浮在无数人的记忆里。这条标语,似乎自我童年时便悬在那儿,无声地注视着广场上的人来人往、舞步起落、夏夜喧嚣。今夜暑气未消,广场上依旧人影绰绰。远处音乐飘来,夹杂着孩童的嬉笑与摊贩隐约的招呼。我与好友并肩走上桥头,眼前是熟悉的灯火,身后是流动的人潮。我眯起眼,又一次望向那两行字,心里那股拧着的劲儿又浮了上来——这话,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像是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朝着墙外大声喊:“快看我看我啊!我就出去让你看!”有些急切,有些天真,还有些一厢情愿的跟踪。

“怀宁需要这样喊吗?”好友被我问得莫名其妙。见他满脸疑惑,我便转开话题,问他为何决定回来发展。他笑了笑:“回来还需要什么理由?在外面一待这么多年,总是要回来的。”

其实他自己未必意识到,这回来的缘由,早已藏在这几年问我的诸多问题里。每次通电话,他总打听怀宁的种种——蓝莓如今种了多少亩、能不能在老家定制纸杯、甚至黄梅戏戏服怎么做……问着问着,心里那份“想回来”的念头,就像春天的草,不知不觉长满了整片心田。他忽然把话题绕了回来:“你刚才说,怀宁需要这样喊……我好像有点明白了。‘让世界了解怀宁’,听起来像是我们要把世界拽到跟前,指着说:‘看,我们有什么’。可真正的了解,或许不该是这样。”“那应该是什么样子?”我问。他思索了一会儿,声音在晚风中显得清晰:“该是我们自己走到世界的桌前,手里捧着好东西——不一定多耀眼,但一定要真,要有用心——然后说:‘尝尝,这是我们怀宁的。’了解,是从这样的底气里开始的。”

他的话,像一颗冰镇过的蓝莓,轻轻落进夏夜微燥的心湖,漾开一圈清亮的涟漪。我不禁想起小时候,这广场边总有卖刨冰的小推车,一两块钱一杯,透明塑料杯里盛着碎冰与糖水,那清甜仿佛能融化整个夏天的黏腻。如今那滋味已难寻觅,可眼前这人、这话,却让我尝到了另一种清凉——一种属于成长后的清醒与深情。我们走下桥,融入广场流动的光影中。一群阿姨正随音乐起舞,衣袖轻扬,脚步从容;少年踩着滑板掠过,

岁岁清明

●沈天鸿

她才50出头。是在血防所治疗血吸虫时跌倒,来不及抢救——那时治疗血吸虫是注射石氨酸钾,一天一针,一般20针。它让血管变硬变脆,不能跌跤。我很奇怪我为什么对祖母毫无记忆。5岁了,应该有记忆了啊。毫无记忆就是陌生人,尽管在理性上我知道她是我祖母,每年我都几次来拜祭,但总是不能产生疼痛。后来读到一则消息:美国埃默里大学的一个研究发现,人在7岁时大脑记忆基本都被清除。看来就是这个原因了。这让我迷惑并有些震惊:这种清除的机制是什么?幸好发生在7岁时,如果成年后也这样,岂不是忘记了世界?

但成年后我们也忘记了多少东西,多少东西也忘记了?即使是长眠的亲人,我们平时也因忙这忙那而忘记了他们。但清明,除夕来临前

是肯定会记起的。

祖父去世时70多岁,死于晚期血吸虫。这种死,甚至在那个年龄死,是他无意中选择的——他中年时离开没有血吸虫的故乡,来到了他将死去之地。在我的记忆里,祖父是个勤劳得不可想象,也古板得不可想象的老头。多年前我在《祖父》中写过我记得的他那些古板得怪异之事。他对我流露温情的只有两件事,一件是为了讨我喜欢,居然游手好闲地驯养了一只八哥。让他失望的是,他按照听来的方法,把八哥尖尖的舌头修剪成了像人的舌头那样的半圆形,据说这样八哥就能学会说话。但没有用,他怎么教那八哥也仍然只说八哥的话。而我对那八哥毫无兴趣。他这件事完全做失败了。另一件是在他弥留时,他吩咐别把他去世的消息告诉我,因为我读书要紧——那时我在读大学。所以

皖水汤汤(外一篇)

●凌闻之

带起一阵风;更远处,小吃摊的蒸汽袅袅升起,融入深蓝夜幕。这一切,熟悉得像呼吸,却在每一次注视中浮现新的细节。

有些人选择留下,却也总有人选择回来。他们走出去,看见了更大的世界,经历了颠簸与繁华。带回的或许不是惊天动地的财富,而是一门手艺、一种视野、一份沉淀过的心境。他们把这“世界”悄悄叠进故乡的图景里,让这片土地在保持本色的同时,渐渐长出新的轮廓,融入对故乡未来更清晰的想象中。因此,“了解”与“走向”,从来不是——一悬挂的标语所能框定的单向行程。它更像一种循环,一次呼吸——是先有敢于走出去的视线与脚步,将故乡置于更广阔的坐标中审视;然后,才有真正有分量的“归来”与“建设”,让故乡拥有足以被世界“了解”的实质,并继续孕育下一程“走向”的勇气与力量。

没有扎实的“内里”,走出去的可能是空洞;没有外向的“探求”,固守的或许只是循环的贫乏。他真的决定留下来了。——皖水汤汤,送儿郎。负笈千里,非为忘乡,实为识方。他日归来,眼中有山河,脚下有故土,方是真返乡。

众日

村里的清晨,总是醒得很慢。天色是鸽灰的,渐渐透出些清冽的蓝。我发动车子,引擎声惊醒了睡在门口树上的鸟。从村里到县城,十几分钟的路程,不长不短。我在这条路上,已跑过近一年。上周,用了多年的行车记录仪忽然不亮了。送去检修前,我拔出那张小小的内存卡,插进电脑。本想确认故障,却不知不觉开了最近一个月的录像。我打开第一段,按下快进。

画面流动起来——第一天。二月十七日,星期一。镜头里是熟悉的村道。拐弯处的白杨还是光秃秃的,枝丫嶙峋地切割天空。远处田垄覆着薄霜,晨光里泛着细碎的银。七点零三分,一个女人蹲在路口池塘边洗衣服。她身旁停着一辆旧电动车,踏板塞着红色塑料桶。她手里的棒槌一起一落,隔着玻璃听不见声音,只看见动作的节奏。

第三天。二月十九日,星期三。天阴得厚,像蒙了一层脏棉絮。路过村口小卖部,店里的老头正把两箱空

啤酒瓶搬到门外。他穿着藏青色的旧棉袄,动作有些慢,弯下腰,直起身,再弯下腰。放下箱子,他站在门口点了一支烟,抬头望望天,摇摇头。路上车少,我开得不急。

第八天。二月二十四日,星期一。出了太阳。阳光斜斜切过路侧那排常绿树——叶子此时显得陈旧、疲惫。树影在柏油路面上拉得老长,轻轻颤动。七点十分,遇见骑电动车送孩子上学的母亲。小女孩裹紧围巾,双手搂着母亲的腰,脸贴在她背上。她忽然抬起一只手,指向天空——应该是一群雁,正排成人字,缓缓向北挪移。

第十三天。三月一日,星期六。周末休息,父亲开了我的车去舅舅家挖菜地。镜头转入更窄的村道。路边菜地里,几畦菠菜绿得发黑。车停在老院前,舅舅从屋里出来,手里拎着几株用麻袋裹着根的苗。两人蹲在地上说话。后来镜头晃了晃——大概是在装车。

第十七天。三月五日,星期三。一场夜雨刚过。路面湿漉漉的,积水映着破碎的天光。路过县城公园的石桥,我慢下来。桥边垂柳的枝条软了、绿了,风一吹,像散开的头发。两个小孩趴在桥栏上往水里扔石子。他们的笑声被隔在窗外,肩膀却一耸一耸的,看得清楚。

第十九天。三月七日,星期五。惊蛰刚过。清晨有薄雾,田野和房屋浸在奶白色的朦胧里。途中看见一株



穿越花海 彭霖 摄

我到放假回家才知道他已经去世。现在想起他的这遗嘱,我仍然有要流泪的感觉。

让我流泪最多的是我的母亲,她刚逝世的那两三年,任何场合,一想起她或者有人提到我母亲,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出来了,以致于很长时间无法写怀念她的文章。时间确实无情,十几年后的现在想起母亲,虽然仍酸楚、疼痛,但不会像当时那样控制不住眼泪了。

我在心里说话最多的也是母亲,我和她说只有她能听见的话。但这只是我以为,能听见我说给她听的,其实是我自己。那些话的声音,能抵达一颗星星,却永远到达不了我的母亲。所谓悼念仅仅是安慰自己。长期悼念逝者的,也只有亲人——这就是芸芸众生。

安葬着我祖父母和母亲的山冈上,桃花油菜花仍然在不断不为人知地飘落,因为这是春天,是清明时节,它们不能不飘落,不得不飘落——那些已经谢了的花,等不到我们从它们身边经过。只有真实的或者心灵里的雨,会继续飘洒,让天空一再被压低……

岁岁清明!

野桃树,枝上已绽出几点粉白,虽然稀疏,却实实在在是花了。雾中看花,像宣纸上晕开的水彩,淡得快要化进空气里。七点零八分,遇见跑步的年轻夫妻,穿着轻便的运动衣,呵出的气在雾里拖成两道白线。下车时,雾正渐渐散,世界一点一点清晰起来。

第二十天。三月十三日,星期四。傍晚下班,天色还未暗透。白杨的芽苞终于绽开了。新叶指甲盖大小,鹅黄的,薄如蜡纸,在微风里轻轻颤着,却又舒展得倔强。田里仍有农人在翻地,拖拉机声隐隐传来。一只白鹭停在田垄上,单腿立着,久久不动,如凝在暮色里的剪影。

第三十天。三月十八日,星期二。这天加班,离开公司时天已黑透。路灯次第亮起,勾勒出归家的车流。路过村口,那株老李子树在夜色中开满了花,朦胧一片粉白,像是夜里悄悄积攒的雪。白天不留留意,此刻在路灯下却看得分明——原来春天也在夜里生长。

我关掉播放器,靠在椅背上。窗外的午后很静。这三十天的路,被压缩成十几分钟的画面,在脑子里还未散尽。洗衣服的女人后来很少见到,也许找到了更暖和的时间。小卖部的老头抽完那支烟,转身回了店里。柳条绿了,孩子换上春装,田翻过了,苗种下了。

春天不是“到来”的。它是这样一天一天、一点一点换出来的。像有人在夜里偷偷调色,今天淡一点,明天浓一分,等我们察觉时,满世界已经是新的。

我把内存卡装回新的记录仪。明天早晨,这条路又会多一段影像。而日子就这样,一天接着一天,把春天走完。

整理遗物时,人们愣住了:几件洗得发白的旧衣服,桌上半包“天柱山”香烟,存折上仅有100元。妹妹做了十几年合同工被下放,他没找过人;自己的孩子没正式工作,他也没开过口。

追悼会上,时任《望江县志》总编辑檀钟送他的挽联写道:“刚直不阿。巍巍如若山屹立;清廉为政,皎皎然似皓月当空。”

如今,安九路上摩肩击毂,武昌湖大桥如长虹卧波。过桥的人或许不知道江良的名字,但望江的老人会说:这座桥啊,是一个叫江良的人,用脊梁扛起来的。

30多年过去了,桥上车来车往。每一次轮胎与路面的摩擦声,都像是一片土地轻轻的回应——那个穿旧衣裳、抽着便宜烟的人,从未走远。

姚国明的诗

某夜	我还是选择走开吗
某夜 我伫立在窗前 而你端坐在云朵上 微笑 人间有多少瞻仰 值得你去采摘呢 我偶然间会想念你 我的同龄 想你离开以后 我做了些什么 而你又在做什么 你抛下面朝大海的情怀 转身走了 你抛下了春暖花开的暖流	我一直选择走开 一直一事无事 我被一个“我走开了”的幻影缠绕着
世間也沒因你而改变多少 人间的喧嚣依旧 唯独我 逐渐淡漠了对你离去的惋惜 就好比此刻孤独和冷漠的夜里 想起你 所有的悲怆 变成了赞叹 等到明天它依然从容地消失 但愿你确定断了归途 人间的眼泪有太多的荒诞	小草 小草晃动 春天的发报机 启动它的手指 天空赤裸销魂 它们走出潜伏期
我走开了	田埂上,小径旁,溪流边。 強力根基,复苏的土壤。松弛柔软的风。 尘世的星光。母牛的足迹。蝴蝶的低吻。 它们细嚼。 悲哀的流转。
我去查违章 许多车停下来 许多人去围观 早晨充满雾气寒意 一阵风散动我的帽子 我走开了	宿露,喝风,吮泥,足够使它们精神
行到另一个路口 “前方施工,请绕道行驶”	如果一个女人足够妩媚,它们定会跪下亲吻 缠绕地的玉足 并窥视她肉色城墙隐藏的门户 如果一个女人足够花心 它们定会用纤弱擦拭她的屁股 哦!要是是一个女人要性子投命跺脚 它们只好做出牺牲顾地自怜 收回它毛茸茸的诱惑
我停顿了一下 象所有聪明人一样 我走开了	它们生吞哲学曰:适应是王道 这不是选择,这不是温床,这不是少女阳台 也不是迎风招展的空中
我去悼念一位死者	安息的灰烬 荒瘠的泥土 坍塌的墙跟 裂开的缝隙 小径走廊不确定的险境
亲人行跪礼待祭奠者 眼眶湿润 我勉强着回应这些亲人的虔诚 但我心里却在不好意思的大笑 礼毕 我走开了	谁都可以对它们嗤之以鼻 谁都有能力不加思索加以摧毁
路过一条小河 河面一阵阵颤动 我怕注视它 它的皮肤里面藏着断魂的故事 或者一个不解的谜语? 我走开了	而太阳始终普照大地 而空气依然充满空间
往前是一个广场在路的左边 里面盛满迷雾 有一尊裸着的男人的雕像	月亮啊,收取你邪恶的笑脸, 蜷伏在冰凉夜的摇篮一角
突然触电似的闪开 那家伙是个冰凉的玩意儿 哦,我的一个幻觉 一个不正经的玩笑	镰刀型细胞贫血,喙尖锐啄噬命运
回到家我摸索着墙壁 试着开灯 但现在还是白天 于是我走到那个叫窗户的地方	头顶上,忽隐忽现的天空 一个不逝的梦
	看呐,一朵云那么高,那么奇异。 叹息,在风中鞠躬
	巨大的悲哀。 没有心 植物性存在 客观世界万千子民 以为下半身有巨大潜力
	小时候嚼过它根汁 小时候奢侈地关照过我的屁眼 最后潦草收场 毫无警惕奔回家中 那是存在我认识里你唯一的价值。
	春天 泥土松动 细细低语 小草最先律动

古韵新声

●徐书奇

端午	敢教雷池无水患, 民生福祉乐无忧。
蒲剑艾旗门上悬, 龙舟竞渡浪生烟。 怡人角黍香天外, 遥寄相思忆圣贤。	齐云山纪行 白岳仙踪梦牵, 随同赏月上山巅。 雨中拾级太虚阁, 健步攀登一线天。
临池感言 墨色朦胧盼曙光, 临摹怎可破迷茫。 纵然写尽千江水, 怎及鹅池半点香。	游天柱山 擎天一柱皖河长, 汉武雄才定八荒。 扶杖轻车上南岳, 石头宫殿胜天堂。
若无灵感休提笔, 锦句吟来喜欲狂。 融入复兴主旋律, 同心戮力奔小康。	古稀初度 常言七十古来稀, 耄耋相随亦可期。 翰墨平生多喜爱, 闲敲雅韵把诗题。
读《安庆日报》2025年8月4日, 刊载《1944 血色徐家井头》有感	浣溪沙 华阳闸赞 新闸完工喜讯传, 望江治水敬先贤, 追思大禹四千年。
县城效外菜园村, 旧案重闻震古今。 百姓无端遭杀戮, 凶残寇寇罪行深。	锁住长江猛野兽, 能排能灌两周全, 为民打造米粮川。
幸福河南站工程赞 街区曾忆水行舟, 南站建成噩梦休。	

江良用脊梁托起武昌湖大桥

●檀电

他抽着最便宜的烟,穿着带补丁的衣裳,走遍安徽省望江县的山山水水。1994年,武昌湖大桥奠基的那天夜里,江良走了,一位老农说:“他是扛大桥去了。”

江良是望江的儿子,十五岁参加工作,十六岁就当上了乡指导员,是当地有名的“年轻老革命”。在基层十几年,他总是一身泥一身水——开幸福河,他第一个跳进冰冷的河道;建皖河闸,他在工棚里一住就是几个月;围垦大小漳湖,他带着乡亲们肩挑背扛,硬是在滩涂上造出万亩良田。

望江人记得,这个县领导有点“怪”;当了农委主任,却很少坐办公室,总往田里跑;当了政协副主席,还是改不了“泥腿子”习惯,说话直来直去,布置工作却条理分明。

但他最“出格”的,是1992年那次。他和24位委员一起,交了一份《安九路必须从望江腹地通过》的提案。当时没人想到,这个“异想天开”的建议,会改变整个望江的命运。

那时的望江,一条主干干道绕着武昌湖转大圈,出趟门要半天。江良带着考察组,从金堤走到杨湾,150多公

里,整整走了4天。晚上在老家乡借宿,他一边揉着肿痛的脚,一边在煤油灯下画线路图。

“人生难得几回搏。”58岁的他主动请缨,担任武昌湖大桥工程副指挥长,把铺盖卷搬到了湖边的蟹苗场。工人们常见他凌晨还在工地巡查,手里拿着个旧手电筒,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新筑的路基上。

大桥奠基那天,江良笑了。那是1994年初春,湖风吹着他花白的头发。当晚回家,他静静地离开了,像终于放下了千斤重担。